

J. J. J. J.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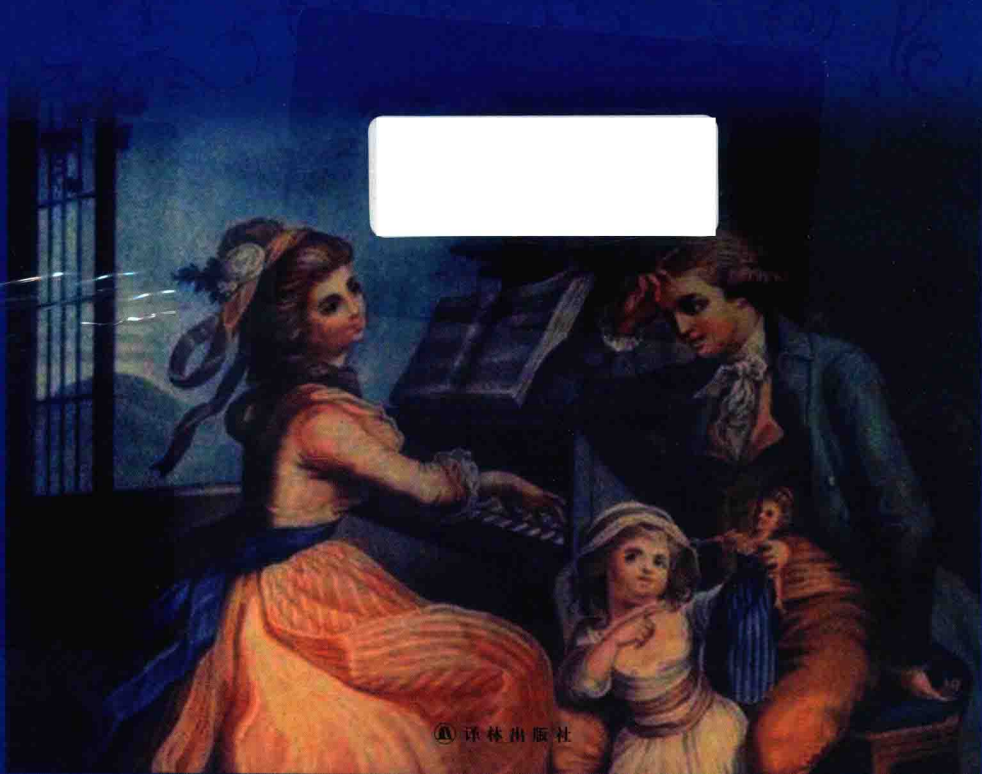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经 / 典 / 译 / 林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国] 歌德 著

韩耀成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Classics

J.W.GOETHE

经 / 典 / 译 / 林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国] 歌德 著

韩耀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的烦恼 / (德) 歌德著; 韩耀成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8 (2017. 12 重印)
(经典译林)
ISBN 978-7-5447-6250-2

I. ①少… II. ①歌… ②韩… III. ①书信体小说—
德国—近代 IV. ①I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505 号

书 名	少年维特的烦恼
作 者	[德国] 歌德
译 者	韩耀成
责任编辑	冯一兵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dtv weltliteratur, 197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插 页	4
字 数	114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50-2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1774年莱比锡秋季博览会开幕时,《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面世了,它像一块巨石扔进当时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会,激起层层波澜。一代人的心翻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燃起炽热的情,整个德国都为这位才智横溢、愤世嫉俗的小说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命运流着同情的泪水。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登长统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的服式,尤其是她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攀缘植物盘绕在维特式的骨灰瓮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对小说中美妙的爱情描写大为赞叹,更多的人则满怀希望地看到,阴霾即将被驱散,太阳就要升起。也有些人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狂热的激情将导致道德沦丧,因而怒不可遏,对“维特”大加挞伐,可是他们未能遏制“维特”的影响。“维特热”席卷整个德国,并越过国界蔓延到欧洲,乃至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维特”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奠定了他一生的殊荣,甚至在他写出一生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学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①,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0页。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歌德把他的许多经历化成了诗，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①。我们了解了这个“片断”，了解了“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与赫尔德的结识对歌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一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

^① 参见《歌德自传——诗与真》，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译文略有改动。



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我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惬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1771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1772年5月，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同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

1772年6月9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车先去。歌德博士也在马车上，他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他并不知道，她已订婚……那天他很开心——他有时如此，有时则很忧郁——绿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尤其是因为她自己毫没在意，完全沉浸于欢乐之中。不消说，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问她参加了舞会身体怎么样。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爱跳舞，爱玩纯真的游



戏,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①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车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吻合,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如小说中维特是到绿蒂家的猎庄上去接她的,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出差在外,未参加这次舞会等等。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超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

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9月11日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9月10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绿蒂的家,在“维特”中歌德把绿蒂的家改成了“猎庄”——笔者)。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②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① 1772年凯斯特纳致友人奥古斯特·冯·亨宁的信,引自汉堡版《歌德文集》,第6卷,第515—516页。

② 凯斯特纳1772年9月10日的日记,引自汉堡版《歌德文集》,第6卷第515页。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①。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

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②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不满: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

①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621页。

②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571页。



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①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二十三岁生日(1772年8月28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1771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马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马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马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B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

^①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623页。



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微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①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

^① 1774年11月7日凯斯特纳致友人奥古斯特·冯·亨宁的信，引自汉堡版《歌德文集》，第6卷，第533页。



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①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②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

① 《梅林论文学》,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页。



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①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② 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1785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市民阶层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③。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254页。

③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563页。



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 60 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1767—1768)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做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①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②的《强盗》(1781)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③《阴谋与爱情》(1784)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1774)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进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④。

三、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维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对此勃兰克斯作了深刻的论述: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4页。

③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5页。

④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①

勃兰兑斯的论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维特心灵的大门，体会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认识这个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维特的悲剧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绿蒂已同阿尔贝特订婚，这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个多月阿尔贝特去外地未归，维特天天和绿蒂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虽然他有时想起或绿蒂谈到阿尔贝特的时候，他的心头就会染上一抹阴影，随后他连续遭受三次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他要走了（1771年7月30日信）。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2—23页。



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他想到“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时,“全身就会战栗不已”(1772年6月29日信)。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对阿尔贝特来说,绿蒂是他“珍贵的财富”,他不愿同别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绿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恋着维特,但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不愿、也没有决心和勇气以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投进维特的怀抱。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处在两难境地的绿蒂,最后下决心与维特疏远,要维特放弃对她的爱恋,并离开她出去旅行。在圣诞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十二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18世纪50至70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①,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

^① 请参阅《歌德自传——诗与真》,第12卷(第563页)和第13卷(第613页)。



年为之着魔^①，盛行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字，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满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的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B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

①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617页。

② 《歌德自传——诗与真》，第618页。



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部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荡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① 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18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思潮,维特身上带着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难者”^②。

有人说,维特对绿蒂的爱恋是“单恋”,“单相思”^③。果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里的描写。维特爱绿蒂,因为她是自然、纯朴和美的化身,而且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绿蒂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她对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喜爱,都是同维特一致的。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以庄严、明快的语言歌颂自然的诗篇《春的庆典》沟通了两人的心灵,她把手放在维特的手上,维特则“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维特感觉到,绿蒂对他的命运是关心的,是爱他的(1771年7月13日信)。绿蒂这一方也并不全是被动,时有主动的爱意的表露:她说话时有时把手搁在他的手上;她还允许维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着嘴给金丝雀喂食,然后把小鸟递给维特,让啄过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亲亲他;她

① 《梅林论文学》,第54—55页。

② 普希金语,转引自《歌德》(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页。

③ 见王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心理分析》,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